

假如你想作个诗人

JIA RUN

2
ANG ZUO GE SHI REN

重庆出版社

假 如 你 想
作 个 诗 人

朱 先 树 编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重庆

责任编辑 杨本泉

封面设计 杨 敏

假如你想作个诗人

朱先树 编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 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25 插页:2 字数:117千
1985年4月第一版 198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8,800

书号: 10114·170

定价: 0.73元

内 容 简 介

你欢喜读诗和写诗吗？
你想作个诗人吗？请读这本
《假如你想作个诗人》。它
将帮助你解答一些你所关心
的问题。

《假如你想作个诗人》
原是北京《诗刊》上开辟的
一个专栏。它陆续发表的一
系列知识性、辅导性文章，
观点鲜明正确，密切结合实
际，受到读者欢迎。本社特
请该专栏的编辑朱先树同志
在专栏文章的基础上，补充
一些篇目共二十七篇，编成
本书出版，以飨读者。

思想·生活·语言

代序

朱先树

写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作一个诗人，我认为起码在思想、生活、语言等方面都应该具备一定的修养。一些初学写诗的同志，诗写不好，往往是因为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没有弄清楚。

现在有的初学写诗的青年同志，对学习马列主义、对政治有一种厌烦情绪，有的同志甚至公开声明：“我讨厌带政治色彩的诗”。

这样的思想情绪是十分错误的。当然这种错误的思想情绪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根源。这要追溯到“十年浩劫”时期，那时“四人帮”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鼓吹“突出政治”，实际上是要用他们反马列主义的一套反动思想理论纲领来束缚人民群众、镇压人民群众。他们这种所谓政治贯穿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在诗歌创作中也是如此。那时除了“东风万里红旗飘”之类作

品外，实际上中国是“没有诗歌”的。人们对这种所谓的“政治色彩”很浓的“假大空”诗歌，十分厌恶和反感，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从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的社会历史就已经出现了新的伟大转折，今天的现实是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奋斗，为振兴中华，向着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祖国的目标前进。这几年的诗歌创作，在反映这种历史转折，歌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高尚的思想情操，起到了积极的鼓舞作用，出现了不少好诗。如流沙河的《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歌唱党，正确看待我们的社会历史和现实发展，正确看待自己等都表现得较好。又如赵恺的《第五十七个黎明》、汪芳的《我拉起板车》、许德民的《一个修理钟表的青年》等把现实生活的艰辛和我们思想信念的坚定等表现得也很准确。这些诗之所以写得好，主要原因就是作者对我们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有着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观点，就不可能准确地描写和把握这样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内容。

诗歌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些大诗人能写出他们的时代乐章，表现人民的心声，首先就是由于他们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仅是一个大诗人，而且是思想家。贺敬之如果不是对雷锋这个先进人物和他代表的时代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那么他的《雷锋之歌》就不可能写得那么气吞

山河，大气磅礴，激动了整整一代人。郭小川如果不是对“四人帮”的罪恶有着深刻的认识，也不可能写出如《秋歌》那么满怀时代的愤怒情绪的壮烈诗篇。应该说，无论是贺敬之、郭小川他们都正是由于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这才更深刻更准确的帮助他们认识了时代，认识了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否则他们的这些诗篇也是写不出来的。

认为政治思想水平高不高对写诗没什么关系，这是错误的。我们看到有一些青年作者往往就是由于思想认识水平不高，在看待和表现现实生活的时候发生了歪曲现实生活的错误。如有一首诗《盆花》：“我家长长的窗台上，放着几个普通的花盆/花儿，伸长脖子/够着，够着地往上奔/其实，那里够着了天？/只是拚命争春/争取金色的阳光，争取维生的水分……”这写生物的自然生长现象，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作者从这里发现了什么诗意呢？原来“他这样拚命/不就是因为根基太贫——/那么一抔土/那么一个小瓦盆……”这一点就已经未必符合花生长的实际了，作为植物，争取阳光这并不因为“根基太贫”，如果不是种在小瓦盆里的花，而是种在深厚泥土里的花，它不也一样要向上争取阳光么，而且“根基越深”，这种争取应该说才能更有力量，“根基太贫”，这种争取也许还会是徒劳的呢！但是作者写这首诗的要旨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一种思想认识：“低的往高处奔，贫的往富路奔，/——啊，明白了，只有这样才能生存！”这里作者所“明白了”，即是说认识了的道理，原来对植物生长来说也是片面的。而如果是用以比附今天党的农村富民

政策，这就更是错误的了，党的农村政策，让农民富裕，这是为了搞活农村经济，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为了整个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如果用生物生长的理论去硬套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岂不是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历史发展的现象了？这不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轨道了吗？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都不懂得，怎么能写出好诗来呢？而象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已经发表的作品中还是时有出现的，至于那些没有得到发表的初学写诗的青年朋友笔下，这类有着思想认识上的错误的作品可能就更多了。

由于缺乏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的修养，使我们对社会生活现象产生歪曲的认识。而由于我们的思想感情境界不高，也会使我们在描写和表现某些题材时，感情倾向发生错误。如有首诗叫《在荒凉的山地上》，写两个“年龄和体态”“不能在任何天平上平衡”的男女，为了所谓“擦去世俗的恶语”跑到“荒凉的山地上”，“重新制定，属于我们自己的法律”，于是“新的世界，将诞生一个新的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这种赤裸裸的鼓吹西方“性解放”的诗，当然是极端错误的，作者写出这样的诗篇，其思想感情的错误也是明显的，这种思想情绪是应该给予严厉批评的。

有的同志说自己不喜欢带政治色彩的诗，当然，诗不一定都是要带政治色彩的，但既然是诗就总不能排斥掉感情色彩，感情色彩的高尚与低俗，正确与错误，同样是有是非界限的，而感情色彩往往是离不开政治思想的支配的，只有政治思想认识水平提高了，写出来的诗

其感情色彩才可能是高尚的，而不是相反。另外，有的同志不愿写带政治色彩的诗，写山，就是松树、柏树、玉兰树、栗树；写海，就是海鸥、浪花、贝壳；写田野，就是蟋蟀、蚂蚱、食心虫、青蛙；写家庭就是父子情、夫妻情、盆花，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可以写的，也是诗的百花园所需要的。但是就是写这些题材，也离不开作者的思想认识和感情倾向，把握不好，也同样写不好。再说，作为一个人民的诗人，如果我们只把兴趣集中在一些狭小的天地里，而看不到广阔的社会人生，发现不了更具有时代意义和美学价值的东西，那么也未必是一种骄傲。小草闲花，可以入诗，但如果只满足于写小草闲花那就值得考虑了。我们的一些大诗人，他们除了表现具有广泛意义的社会现实以外，也写小草闲花，他们的整个创作也是丰富多样的统一，但他们也总是有自己的主调，那就是为时代为人民而歌唱。我们还看到有的大诗人，他们写小花小草，往往也是包含着社会深意的，如艾青的《鱼化石》等。这就是说，题材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但思想认识水平的高或低，感情倾向的高尚或低俗对作品的格调则起着决定的作用。写小花小草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把写小花小草作为一种厌恶“带政治色彩”的创作目的来追求，那就是极端错误的了。因此，我们初学写诗，就不应带着某种思想偏见，认为只有政治性强的诗才是好诗，或唯有“不带政治色彩”的诗才是好诗，这都是片面的。思想的偏狭就会带来创作上的偏颇。我们要时刻牢记，我们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写诗的，有了这个明确的目标，才可能写出真正思想上和艺

术上都好的作品来。

二

关于诗与生活也是个老题目了，但它也是一个可以说常新的题目，而现在很多初学写诗的同志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还并没弄得很清楚呢！

关于生活的概念，我认为现在就还存在着较为混乱的理解。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把生活的概念狭隘化。如有的同志把诗分为政治诗或生活诗，说某某诗是写生活的，某某诗不是写生活的，等等。于是往往把描写和表现工人农民劳动的诗当做反映了生活，其余的就不是反映生活；另外也有人还有更为狭窄的理解，认为生活就是我的生活，甚至吃喝拉撒等日常琐事描写才是写生活，有生活气息，我认为这种种对生活定义的理解都是片面的、偏颇的。

生活，作为艺术描写和反映的对象，我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生活主要是指社会生活，而不是专指社会中某一部分人或某些个人的生活。因此，生活既然是社会性的，它就必然有其时代特有的内容，有这个时代不能混同于别的时代的特定的质的东西。如果不抓住这个特有的质的东西，你就反映不出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起码是表现不出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特质，或在这个特质规定和影响下的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包括各个细微末节的生活的真谛来。对生活这一概念的这种理解，我认为对诗的创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诗与其他文学形式比较起来，它反映生活自然更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小说、报告文学、电影、戏剧等叙事性较强的文学形式，它们主要是通过塑造人物，通过选取一定的典型情节编织动人的故事，来表达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某种认识和看法，从而使作品具有某种思想的和美学的意义。诗却不同，在反映社会生活上，它并不如小说等样式那样，有着直接的情节、人物和故事，而往往只是一种主观的感情形态，有的诗甚至除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和情绪流露之外，我们可能根本找不到什么直接的社会生活的某种原型的东西。因此也有的同志就从这里产生了错觉，认为小说等叙事文学反映生活，离不开生活，而作为诗是可以不反映生活，只要“表现自我”就可以了，于是有的人认为“诗离生活越远越好”。要指出这些认识的错误来，我们不能用一般文艺概论所讲的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去硬套，那样是不能具体说明问题的，也是不可能真正说服人的。我认为诗反映生活不同于小说等叙事文学之处正在于，它重点不是再现生活的某种画面，而是主要在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某种感受；它主要不是表现生活的具有某种内涵的画面，而重在传达生活的某种信息；诗人的职责，就是将这个社会生活的信息准确生动地通过诗人主观感受的形式传达给读者。我认为只有这样来理解诗与生活的关系，才能说明问题。

诗反映生活重要的是写出诗人对生活的某种感受。诗人生活在一定的时代和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他对社会生活的某种真实的感受，如果表现得好，就可能写出好诗来。诗人生活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周围的一切

随时都可能刺激着他的感情，“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水对风的感受是敏锐的，而诗人的思想感情的池水，如果受到生活之风的吹拂它也会波涛起伏的，诗人对社会生活所引起的刺激，产生出某种感觉，某种情绪，某种想象，某种思考，这就可能成为诗的种籽或胚芽。在诗的表现中，这种生活感受大致可以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由生活的某种具体现象唤起诗人的某种情绪；一是诗人长期的生活感受的积累，忽然找到了某一具体事物作为对应物而表现出来。这两种情况在诗歌创作中都是经常发生的。

先说第一种情况。在日常的生活中经常会有一些细小的事物刺激我们的感官，引起我们的一阵激动，如果能及时敏锐地抓住和把握这种感觉，就有可能写出一首好诗来。如有一首诗叫《花，悄悄开放在街头》：

沉睡了许久许久

朦胧中

花，悄悄开上了街头

就那么一点不多的颜色

已经强烈得使人目眩

什么时候

风也变得有些温柔

烈焰一样灼人的油漆

融化了，消失了

花，悄悄开上了街头
穿小喇叭裤的孩子
追捕蝴蝶
扬着小手

初来北京留影的人
背景不光选在古老的城楼
首都的变甜了的风
会吹遍人生的每一个港口

一阵香气袭来
淡淡地使人想起
那禁花的“火红的年头”

花，悄悄开上了街头
生活的脚步向前行走

这首诗在艺术上可能还有不够完美之处，但它可贵的是写出了诗人对生活的真实感受，而且较为准确地传达出了“生活的脚步向前行走”的生活信息。这首诗写于一九八〇年，作者在说明这首诗的写作情况时说：“那年九月，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送一件稿子，在传达室门口等待引领的间隙，偶然被大门外临街的花坛吸引住了。”

“返回的路上，我专心寻找，在另外单位的门口又发现一个”，正是这两处花坛，生活中的具体事物触动诗人的

感情，使他联想到“十年浩劫”的“红海洋”，联想到那时养花被当做资产阶级情趣来批判的情景，今天又出现种花的花坛了，“花的命运在对比中道出了时代的变迁”，这种由花引起的外在刺激使诗人传达出了这“时代变迁”的生活信息来，这就是诗，这就是来自对社会生活真实感受的诗啊！

第二种情况是有的诗所选择的形象在生活中可能是极平凡的甚至是极为不重要的，与社会生活变化完全无关的，但由于诗人对社会生活的感受通过它传达出了生活的某种信息，它仍然是好诗。如公刘有一首诗题为《扭柏》，写洛阳关林的一棵古柏，自根至梢作螺旋状，生态极为奇特。这本是旅游中碰到的极为普通的自然现象，它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但作者却写出了它的诗意来了：

我想到了被扭曲的苦痛

我经历了挣扎着的上升运动

离心力和向心力保持危险的平衡

历史，行进得突兀而又从容

能扫荡世间一切积垢的

唯有人民自己兴起的龙卷风

这里是写扭柏吗？是，但又不是。原来诗人主要是通过这自然界的扭柏，来表现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看法，

它为我们传递出了一个被扭曲时代的生活信息，它是诗人对社会历史感受和人生经验的综合表现，因而写的虽是自然界的生长了多少年代的并无特殊变化的扭柏，实际上是诗人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深沉而真实的表现。扭柏不过是诗人找到的表现主观感情，传达社会生活信息的一种对应物而已。

在初学写作者中，在处理诗与生活的关系方面，有两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是把对生活的认识往往赤裸裸地写出，表现的是一种概念，因而显得空泛。而且这些概念本身可能还并不是作者在社会生活中真正感受和理解了的，它或者是接受的一种空洞的生硬教条，而自己又用诗的形式去向读者说教，由于它不是诗人对社会生活信息的传达，而是简单的“传声”，因而是没有感情没有血肉的，也是不可能动人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初学写诗的同志发现不了生活中的诗意的东西，一说要反映生活他就只顾去描写一些生活的现象，或者写得太实，甚至象写小说似的，从头至尾分行排列叙说下来（其实小说也是需要剪裁的，不过那是属于另外的议题了），以为这就是诗了，这是对诗的一种误解。古人说文是饭，诗是酒，写诗比写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更困难，它对生活的酿造工艺要更复杂。可是有的初学写诗的青年同志却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往往认为写诗是最容易的，随便一件什么事情，随意地加以排列叙述出来以为这就是诗了，这种对诗的认识与真正的诗还有太远的距离，抱着这种认识去写诗，也是不可能写出好诗来的。

三

诗的语言必须是诗化的。

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实际情况是，按诗的形式分行排列的语言不一定都是诗的语言。这不单纯是指初学者的习作，包括一部分经常写诗的同志的作品和报刊上发表的不少诗作，在语言运用上都还不一定是诗化的。

那么诗的语言运用应有什么要求呢？我们对一般文章的语言要求是准确、鲜明、生动，但作为诗的语言，虽说也首先应是准确、鲜明、生动，但它却还有自己的特殊的要求，诗不光是通过语言表达某种事理让你明白什么，而更注意表达的是一种情理让人们从中要理解什么。因此，它不是一般的平板叙述，而是需要立体的形象表述。如有一首诗写两个青年犯了罪，法院判决后在墙上贴出了一张布告，它的开头就是这样写的：

一切都惊诧了：

正在上升的太阳猛然停下
高楼蜂拥着跑来突然站定
心，重重地被推向雪白的墙上
新贴的一张法院布告

就这么一件事情，如果只是为了要告诉读者墙上贴出了一张布告，是大可不必这么写的，但作为诗，它不但要

告诉读者有这么一件事情，而且还要让你感受到在对待这件事情上作者主观的强烈的感情色彩。作为一个事件的叙述，拉扯上太阳、高楼等那是多余的，但作为一种感情色彩的表现，就非有这些东西不可，而且这些形象还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太阳本来正在上升，由于惊诧，它忽然停止了，高楼本来是静止的，却也蜂拥着跑来突然站定了，原来都是为了这张突然新贴出的法院布告。在这里只笼统使用“简洁”这样的词来说明诗的语言的特点就够了，因为在表达情理上它是准确的，简洁的，但作为事理的表达，那就可能是不准确的，啰嗦的了。这是诗的叙述，与一般文章的叙述在语言使用上的区别。

诗除了叙述外，有时也需要说明道理，但这种诗的说明和理论文章的说明又是很不相同的。如李钢的《舰长的传说》一诗中写舰长的爱国主义情怀，写他对中国近百年海上斗争的历史激励着的爱国情绪，但诗却并不正面去讲明这些道理，只是说“他一人踱步海湾，在沙滩上坐着或者躺下，点燃那根海柳木的黑烟斗，这时我看见一八四〇远远地燃烧”，还说“我曾在夜里溜进舰长舱，结果我看见他胸脯象海浪一样起伏，我听见了甲午年隆隆的回声。”如果作为爱国主义的理论说明文字，人们会认为是莫名其妙的，但作为诗的语言，读者不但可以接受，而且还觉得非常新鲜生动，仔细一想也觉得是贴切的、合理的呢。再如作者直接写舰长的爱国主义情怀，决心为保卫祖国海疆，警惕地坚守战斗岗位时是这样写的：